

默啜可汗时期的后突厥汗国

袁志鹏

(重庆图书馆 特藏文献中心, 重庆 400037)

摘要:默啜可汗在位时期,后突厥汗国成功地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内外政策和措施。对外,默啜可汗采取和战并行、软硬兼施的策略,扩大汗国的领土范围,为汗国的发展谋取了较大的利益;对内,则加强自身政权建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高汗国的社会生产力。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使后突厥汗国逐渐发展壮大,步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成为唐朝北部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后突厥汗国 默啜可汗 内外政策 汗国利益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596(2012)04-0013-03

后突厥汗国复兴并建立政权后,共存在60余年(682-744),历任可汗有9位,默啜可汗在位时期(天授三年至开元四年,692-716)堪称后突厥汗国最辉煌的时期。颉跌利施可汗去世后,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为可汗。默啜可汗在位时期正值唐朝内部权利更替频繁、局势多变之时,短短的二十余年内,唐朝最高统治者连易武后、中宗、睿宗、玄宗四主,高层政局动荡不稳,而后突厥汗国则借机发展壮大,步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后突厥汗国的这一丰功伟绩,同默啜可汗的内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对外,默啜可汗采取和战并行、软硬兼施的策略,在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征服了许多政权或部族,在汗国内部,则加强自身政权建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设法提高汗国的社会生产力等。

一、默啜可汗和唐朝的关系

此一时期内,默啜同唐朝的关系的最大特点是欺骗和打击并重。默啜采用两面手法对付唐朝,一方面是不断地武力进攻唐朝的边境,掠夺财富、彰显武力,另一方面是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假意同唐朝和好,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或腾出人力和物力对付其他方面的势力。默啜可汗在位时期,仅《资治通鉴》记载的后突厥汗国对唐边境的骚扰、掠夺的记录就有7次,其中以圣历元年(698)、长安二年(702)、中宗神龙二年(706)这3次进攻的规模最大,对唐朝的危害也最深,下面分而论述之。

“(圣历元年),八月,默啜移书数朝廷曰:‘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绀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妄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唐廷)以司属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沙陀忠义为天兵西道总管,幽州都督下圭张仁愿为天兵东道总管,将兵三十万以讨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卫

大将军阎敬容为天兵西道后军总管,将兵十五万为后援。癸丑,默啜寇飞狐,乙卯,陷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吏民数千人。九月,戊辰,默啜围赵州,长史唐般若翻城应之。……甲戌,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戊寅,以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右丞宋元爽为长史。右台中丞崔献为司马,左台中丞吉项为监军使。……癸未,突厥默啜尽杀所掠赵、定等州男女万余人,自五回道去,所过,杀掠不可胜纪。沙陀忠义等但引兵蹙之,不敢逼。狄仁杰将兵十万追之,无所及。默啜还漠北,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

“(长安二年),突厥寇盐、夏二州。三月,庚寅,突厥破石岭,寇并州。以雍州长史薛季昶摄右台大夫,充山东防御军大使,沧、瀛、幽、易、恒、定等州诸军皆受季昶节都。夏,四月,以幽州刺史张仁愿专知幽、平、妫、檀防御,仍与季昶相知,以拒突厥。”

“(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己卯,突厥默啜寇鸣沙,灵武军大总管沙陀忠义与战,军败,死者六千余人。丁巳,突厥进寇原、会等州,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

圣历元年的南进,导致单于都护府被迫徙置于安北都护府所在的河西治所^[1],后突厥汗国不仅占有了单于都护府故地,掠夺了大量的人口和物质财富,壮大了自身的军事实力,还使臣属于唐朝的东方诸蕃,纷纷叛唐归附后突厥汗国,“自是高丽旧户在安东者渐寡少,分投突厥及靺鞨等,高氏君长遂绝矣。”^[2]靺鞨主大祚荣“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3]。

长安二年(702)的南进,起因是攻掠已降于唐朝的六胡州粟特人,六胡州是唐朝为安置归降的九姓昭武而设置的,由于这些粟特人曾经臣服于突厥,突厥化非常严重,唐人文献往往将其视为突厥人,“初,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

胡州’”^[4]。河曲地区宜农宜牧,六胡州的粟特人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归宿地,从心理上已经认同了这一地区,但是由于后突厥的骚扰、掠夺,唐王朝又不能提供相应的庇护,六胡州的粟特人大量外迁,纷纷投降后突厥汗国,六胡州不得不在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大掠六胡州后,后突厥并没有退兵,而是继续南下,掳掠唐的盐、夏等州,杀掠人吏,攻破唐的石岭要塞,围并州达半月之久。

中宗神龙二年(706)的鸣沙之战,唐军也损失惨重,仅死伤人数一项,诸书记载就不一致,上引《资治通鉴》以及《旧唐书》卷 194、《通典》卷 198、《太平寰宇记》卷 196 都记为六千余人,而《新唐书》卷 215、《旧唐书》卷 7、《元和郡县图志》卷 4 则认为唐军死伤 3 万人或数万人,《毗伽可汗碑》记有:“当我二十二时,我出兵唐朝。我同沙陀将军八万人交战,将其军队消灭在那里。”^[5]那么唐军的伤亡人数就绝不仪 6000 人,很有可能是 3 万人或更多。鸣沙之战结束后,突厥人进一步南进,掠陇右牧马万余匹而去,鸣沙城也因荒芜废。

同时,默啜可汗还利用各种机会假意同唐朝和好,以获取更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壮大自身的力量。如嗣圣“十二年十月,默啜可汗遣使请降”^[6],这里的嗣圣十二年指 695 年,武周时期的天册万岁元年,“太后喜,策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7]。时默啜篡其兄位不久,国内各势力未必完全服从其统治,默啜的做法使其获得了唐朝政治上的支持,便于其号令国内各派势力。

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举兵反,攻陷营州,杀都督赵文翽。李尽忠是孙万荣的妹夫,两人皆居于营州城侧,都督赵文翽刚愎自用,契丹发生饥荒而不加赈给,把契丹酋长当做奴仆看待,是故李、孙二人怨而反叛。同年七月,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以孙万荣为前锋,四处略地,所向皆下,仅仅 15 日左右,李尽忠兵至数万,遂向唐檀州发动进攻。不久李尽忠死去,契丹攻势稍减,但当年十月,孙万荣收合余众,契丹军势复振,乃遣其手下将领骆务整、何阿小为前锋,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唐河北震动。

针对契丹的叛乱,唐廷很快作出战略部署,令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司农少卿麻仁节率兵讨之,与契丹战于西硖石谷,唐军大败,张玄遇、曹仁师均被俘虏,唐又令夏官尚书王孝杰、左羽林将军苏宏晖领兵 7 万再讨契丹,但全军覆没,王孝杰在阵战没,苏宏晖弃甲而逃,唐廷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河内王武懿宗为大总管,御史大夫娄师德为副大总管,右卫卫将军沙陀忠义为前军总管,率兵 30 万以讨之,无功而罢,仍没有解决契丹的叛乱。

默啜可汗利用唐朝的这一困境,假意与唐朝和好,“请为太子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但要求唐朝答应以下条件:交还丰、胜、灵、夏、朔、代

等六州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索要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许婚^[8]。唐廷为了尽快剿灭契丹的叛乱,答应了默啜可汗的请求,双方约定,唐军从南路进军,后突厥汗国从北路进军。最终,契丹的反叛虽然被平定了,但是从中获利最大的却是后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一箭三雕,不仅得到了唐朝赏赐的大批物质和单于都护府之地,而且还迫使契丹余众及奚、霫皆降于突厥,后突厥汗国愈益强盛,对唐朝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所以圣历元年、长安二年、神龙二年发动了对唐朝的大规模的进攻。

二、后突厥汗国对九姓铁勒的征服

默啜可汗即位时,后突厥汗国虽然已经成功地在于都斤山建立牙帐,但漠北九姓铁勒仍然臣服于唐朝,以回纥酋比粟为首的安北都护府仍然存在,漠北九姓铁勒都隶属于这个都护府治下,后突厥汗国要想称霸漠北,必须像摧毁单于都护府那样摧毁安北都护府,而当时漠北的形势也为默啜可汗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垂拱元年(685),以同罗、仆固为首的亲突厥派发动的叛乱虽然被唐朝派兵镇压下去了,但是忠于唐朝的回纥、契苾、浑、思结等部由于西突厥的掠夺,自身也遭受重创。默啜继位以后,随着后突厥汗国势力对漠北渗透的加剧、唐朝因内部的权利斗争所造成的对漠北九姓铁勒利益的伤害,以回纥为首的亲唐派在漠北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后突厥汗国正是利用这一大好形势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安北都护府,漠北铁勒中倾唐一派被迫徙于唐境内:“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9]《旧唐书》卷 199 下《北狄·铁勒传》亦有相似记载:“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留居漠北的铁勒各部,都隶属于后突厥汗国的统治下,“在碛北者,自则天后,并为默啜所役属,仍别立都督以统之”^[10],默啜终于实现了一统大漠南北的愿望。

默啜还派兵征服了活跃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一带的拔悉密部落,使其臣服于后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碑》云:“当我二十岁时,拔悉密亦都护是我的族人,我因他们不派贡使来,出征(他们)……我臣服了(他们)。我把许多(战利品)……运回家中。”^[11]毗伽可汗为后突厥汗国创立者颉跌利施可汗之子,生于 684 年,其 20 岁时为 703 年(武则天长安三年),正当默啜可汗之时。

默啜还成功地粉碎了唐朝支持下的西突厥、黠戛斯、突骑施三方企图合围后突厥汗国的阴谋。后突厥汗国的壮大引起西突厥、黠戛斯等的极端仇恨:“让我们首先出兵(攻打)突厥可汗。如果不向他出兵,早晚他们要把我们消灭。因其可汗是勇敢的,其顾问是英明的。让我们三家联合出兵吧!让我们把他们彻底消灭吧!”^[12]默啜决定先发制人,景云二年(711)东突厥先后出兵黠戛斯和突骑斯,并取得了大捷。《阙特勤碑》对此描写到:“当阙特勤二十六岁时(711 年,阙特勤生于 685 年),我们出征黠戛斯。从和矛一样深的雪

中开道,越过曲漫山,我们袭击黠戛斯人于睡梦中。我们与其可汗战于 Sunga(松戛)山。……我们杀死了黠戛斯的可汗,取得了他的国家。那年为征讨突骑施,我们越过阿尔泰山,渡过了额尔齐斯河,袭击突骑施人于睡梦之中。……在那里我们杀死了他们的可汗,取得了他们的国家。”^[13]《毗伽可汗碑》也有相似的记载。

三、默啜可汗的治国之策

默啜可汗吸取了东突厥汗国灭亡的教训,加强后突厥汗国内部的建设,推行一系列改革,缓和了阶级矛盾,强化了中央集权。《阙特勤碑》东面第16行云:“我叔父继位为可汗后。重新组织和养育了突厥人民,使穷的变富,使少的变多。当我叔父即位为可汗时,我自己任达头人民上面的设。”^[14]“设”是突厥汗国一武官,《新唐书·突厥传》云:“其别部典兵者曰设。”设是除可汗之直属部众外,别部之掌握兵权者,达头民众是后突厥汗国西部区域之民众。圣历二年(699),“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拓西可汗”^[15]。

默啜还大力发展汗国的农业,重视粮食生产。前述神功元年,默啜借讨伐契丹之名向唐朝索要的众多物质,主要是数量不菲的谷种、农器、铁等,这些物质不仅可以促进汗国内的粮食生产,减少对唐朝的粮食依赖,还有利于汗国内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马长寿先生在其大作《六到八世纪突厥社会研究》一文中指出,“697年(唐神功元年),突厥默啜可汗向唐室要求统治从前曾经投降中国的河曲六州降户几千帐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同时并索给粟种十万斛,农器三千具及铁器几万斤”,这一措施的实施,“对于突厥汗国和牧民发生了以下三种影响:第一,使汗国一部分牧民的生产形态跟着变化了。从前突厥牧民的生产是游牧,现在除了畜牧之外又从事农业生产。农业虽然是对畜牧服务的,但它可以稳定牧民的生活,哪怕这种稳定生活是暂时的;第二,突厥汗国的各族人民从此有了田种,有了农具,更有了铁的生产工具和武器,这样就自然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生产力;第三,畜牧主占有了农具和田种,封建主掌握了更多的铁器和铁兵器,从而也就加强了他们对牧民的统治和剥削”。“唐室又归还于突厥汗国以几千帐降户,同时又给田粟四万斛,农器三千具,铁四万斤,这些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不可能对汗国封建主义的形成不发生重大作用的”^[16]。

默啜善于利用婚姻关系处理同其他政权的关系或把婚姻作为统治汗国的一个重要手段。婚姻是默啜博取利益或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筹码。如在前述神功元年(697)默啜上表要求作武则天的义子并为其女请婚时,开出了很高的要价,但是当唐朝答应了默啜的要求、和亲使团抵达突厥后,

默啜却借口和亲对象是唐王室李姓,武氏小姓不配和默啜女儿成亲,并单方面地开列了唐朝没有真正履行诺言的五大罪状,于圣历元年(698)向唐发动了进攻,掠夺唐边境。长安三年(703),默啜又请求将女儿嫁给皇太子李显的儿子,但李显继位后(唐中宗)默啜却发兵攻掠唐边境,唐中宗下诏绝其请婚。景云二年(711),因后突厥汗国西线战事吃紧,默啜又向唐朝提出和亲,取得睿宗同意,由于睿宗很快传位于唐玄宗,此次和亲未果。开元元年(713)默啜派儿子到唐朝求婚,唐玄宗以宗室女和亲,但默啜却不信守诺言,于次年出兵攻打唐的北庭都护府,被唐守军击败。默啜同唐朝和亲的反复,完全是根据对外政策的需要而制定的,和亲起着麻痹唐朝的作用,和亲之后往往是对唐边境的大规模的掠夺,和亲也是默啜摆脱困境或避免两线作战的一种权宜之计,反抗后突厥的政权往往和唐朝结盟,合围后突厥汗国,和唐朝和亲则可以防止对手和唐朝结成稳固的联盟,避免南线局势的紧张。默啜还善于利用婚姻笼络控制其他部族,作为其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和默啜建立姻亲关系的除唐朝外,还有远在辽东的高丽以及汗国内部的火拔颉利发、阿史德胡禄俄等贵族首领,这些贵族首领起着协助默啜可汗统治的重要作用。

在默啜的经营下,后突厥汗国东西万余里,控弦四十万,自颉利之后最为强盛,成为可以和唐朝相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默啜没有能很好地维持这一局面,而是自恃兵威,虐用其众,致使其部落渐多逃散或反叛,到默啜晚年,这一局面更加严重,默啜本人也死于北讨九姓铁勒的返回途中。

参考文献:

[1]李宗俊.唐代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再考[J].中国史研究, 2009 (2).

[2][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28,5360.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6.

[5][11][12][13][1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159,159,99、101,130-131,125.

[6][10]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004,2067-2068.

[7][8][9][1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503,6509、6516,6779,6543-6544.

[16]马长寿.六到八世纪突厥社会研究[J].历史研究,1958 (3、4).

(责任编辑 张海鹏)